



喇嘛王国的衰变

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中，大昭寺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

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

彼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

妥协与崩溃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十四世达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

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



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

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毛泽东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

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21期 汤耀国 胡星/文）

1946年10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周恩来准备率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撤回延安。临行前，周恩来安排龚澎等人前往香港，充分利用香港中间地带的特殊条件，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使国统区人民和海外华侨、外国民众都能了解国内情况，了解共产党的主张。10月26日，龚澎等人到达香港。根据中央的“利用报刊媒介，在中外人士中，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的指示精神，他们于香港英皇道173号着手

筹划英文期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的编写与出版工作。12月31日，《中国文摘》在香港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文摘》的主编之一龚澎，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联络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发布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1946年5月17日，为了“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压倒蒋之反动宣传”，便于在国际上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斗争，宣传中共“反对内战、反对

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的主张，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在上海公开发行。乔冠华担任总编，关振群、孙一新任编译，龚澎在其中负责发行等工作。尽管该刊很快被国民党下令查禁，存在时间短暂，但还是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也为之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为了办好《中国文摘》，龚澎带领5名同事，从写稿组稿、编辑、翻译，直到每两周到印刷厂的校对与出版发行，每人都身兼数职。许多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都是龚澎等亲自动手。每期《观察家》栏目的社论，则大多出自龚澎之手。她常常将延安窑洞的精神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或外事工作中所接触的舆论结合起来加以评述，内容简洁有力，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精心工作下，《中

国文摘》问世未久，便有很多国外人士前来订阅或托友人代为购买，其影响逐步扩大。

除了《观察家》栏目外，《中国文摘》的常设栏目还有要闻综述、政治家论坛、记者论坛、读者论坛、书评、艺术、文化界、在中国大地上等以及刊登反映当时中国的热点问题的照片和图片。此外，《中国文摘》还根据时局的需要，以英文刊登了毛泽东等人的一些文章。如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其中有的是毛泽东著作最早的英文版本。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中国文摘》对于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2月，《中国文摘》将出版权转交新成立的《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

（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5月18日 鲁克亮 刘琼芳/文）

中共首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期刊